

第一章 中国民主党派的出现

(1927—1931)

一、“中国到那里去？”

现代政党的产生，往往是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促成的。中国最早的民主党派，创建于大革命失败后特殊的历史时期。

1924 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当时中国政坛影响最大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使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共两党不仅共同创立了黄埔军校，组建了国民革命军，而且于 1926 年夏举行了北伐战争，把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使国民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北洋军阀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虽然中共希望通过同国民党的合作增强革命的力量，但第一次国共合作毕竟是以国民党为核心的两党合作，随着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消涨，左右派之间的矛盾与分化，都使国共合作孕育着严重危机。1925 年 3 月孙中山去逝后，8 月，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被右派暗杀。而国民党内出现了研究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戴季陶，戴季陶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儒学化，把三民主义纳入中国传统伦理的范围，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遭到阉割。他还将其民生

主义研究延伸到社会领域，提出组织团体具有排他性，主义与主义之间不可能联合，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戴季陶的理论，为国民党右翼势力反共提供了理论依据。加之当时中共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了国共合作的破裂。

1927 年 4 月—7 月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驱逐共产国际代表及苏联顾问团，展开大规模的“清党”、“清共”运动，镇压工农运动，国共合作破裂，中国陷入内战状态。

“中国到那里去？”

大革命的失败，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社会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探讨和争论，也带来了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各种政治力量高举着自己的旗帜即思想理论，设计中国发展的道路，开始了一场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角逐。

1.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中国的思想领域出现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革命前途的论战。

在中国革命由北伐战争的高峰骤然转入低潮的情况下，一部分大革命中满腔热忱投身革命的人陷入了苦闷、彷徨的境地，但更多人由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的产生了种种疑问，进而开始对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其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首先摆在了人们面前，因为对社会性质的认识，直接关系到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样的革命。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中国的思想领域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进入了一个异常活跃的时期，代表各个阶级、阶层的政治家、思想家围绕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论战中，总体上

看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二是认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或称民权革命，平民革命；三是认为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要进行的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争论的焦点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当时，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特殊性，社会内部生产关系的复杂以及外国势力的侵入，使中国不是某种“单纯”的社会形态。例如陶希圣在《新生命》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文章，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自帝国主义入侵后新生了“资产阶级”的“宗法封建社会”。王学文、潘东周等人则在《新思潮》发表文章，从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入手，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存在，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大桎梏，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有发展，但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优势的仍然是封建经济关系，而中国的社会性质只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严灵峰等人则受大革命时期苏共党内托洛茨基观点的影响，坚持认为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当时，中共以积极的态度投入了这场论战。李立三等人撰文首先批驳了党内的一些错误观点，诸如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目前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等等，坚持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中共正是根据这一基本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处于国共两党之间，作为中国中间阶级、阶层政治代表

的一些人士，也在论战中提出了自己的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如邓演达提出中国社会处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下的“前资本主义的时代”。从而为他进一步创立平民革命理论提供了依据。邓演达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与中共基本相同，因而中共与邓演达创立的第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实质上存在着很多的一致性。

这场思想领域的论战，后来延伸到对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探讨，它不仅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也引起了中共以及一些中间党派对土地问题的重视，有的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革命的重要任务，有的直接从农村建设探讨中国发展的道路。可见，这一时期思想领域的论战，对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在大革命失败后，继续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起到了提高认识，辨析方向的作用。

2. 面对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中国的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都在进行重新思考，重新选择，各种政治力量开始了新的分化组合。

中国国民党内一直存在的左右两大派别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出现了大分化。右翼势力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在一致反对三大政策的前提下，实现了宁汉合流。蒋介石集团在经过“二次北伐”及“东北易帜”后，终于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建立起国民党一党独裁政体，确立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地位。而以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则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共独裁政策，指出国民党“已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1927年8月，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柳亚子、屈武等，联合共产党人林伯渠等，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

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等“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他们逐步从国民党内分化出来，寻求实践孙中山三民主义理想的新途径。

当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仍然继续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希望建立一个“左派的国民党”，维持国共合作。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当时仍使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直至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后，中共才彻底放弃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努力，领导一部分工农武装转入农村，走上了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变化。1927年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虽然克服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对反共屠杀极端仇视，对右倾错误极端愤怒的情绪，却为“左”倾错误的出现埋下了隐患，表现在对国民党左派以及中间势力的问题上，由联合变为了敌视。一些中共党员或出于对共产国际某些错误指导不满，或出于对“左”倾政策不理解，或出于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脱离了共产党。有的开始从事创建新党的活动。

此外，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阶层，他们中的一部分依附了国民党政权，一部分则采取了观望态度，既不赞成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不赞成共产党的“左”倾政策，而希望在国共以外另辟一条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

二、第三党的创建及其政治主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及思想状况，为新党的产生提供了适应的环境。最早出现的民主党派是第三党，它是当时社会上对 1928 年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和 1930 年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统称。

1. 第三党的创建活动

在这一时期最早从事建党活动的是邓演达、谭平山等。

谭平山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在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十分器重他，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在国共两党中均有很高威望。在大革命中，他最早提出了成立第三党的设想。

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右派开始不断制造反共事件，使中共内部对国共实行的党内合作形式出现了不同看法。1926 年 11 至 12 月，谭平山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扩大会议。在大会发言中，他对当时中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第三党问题。他认为，当前中国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团结革命力量”，而关键是国民党问题。“所谓国民党问题，我们指的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么在现在的国民党内组织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控制，清除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要么不要国民党而成立新的第三党，例如工农党或联合党。”在具体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他认为成立第三党“暂时只能作为尚未定型的趋势存在罢

了，^①中共应继续同国民党进行合作。

在国民党内，左派代表人士邓演达在亲眼目睹了一出出急剧变幻的政治风云后，为了挽救革命，并“把总理的主义还原”，“叫真实代表中国革命斗争的理论——三民主义——表现在同志面前”，“把后添的、蒙混的、神秘的色彩去掉，拿科学的批评方法清洗，去还他的真面目”^②，也开始了创建第三党的活动。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现属惠州市）人，早年就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曾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独立营营长、第三团团长。1924年国共合作后，他竭诚拥军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受命筹办黄埔军校，曾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后又任教育长。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内，他历任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孙中山先生曾说：“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两达”之一就是邓演达。

在大革命中，邓演达逐步形成了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基本认识。1927年2月底，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邓演达在会议期间曾与蒋介石长谈，对国共合作问题、军事发展后政治上设施问题、农民问题、党的组织和领导问题等进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179—1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出版

② （邓演达文集）第28页

行了剖析。而蒋介石则表示坚决分共，农民问题需待统一全国后再办，其它问题不必谈了。^①邓演达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蒋介石拒绝革命的真面目。会后，他来到武汉，试图通过探索和努力，开辟自己的道路，挽救中国革命的危局。

在武汉期间，他已经开始酝酿组织第三党。他与国民党左派彭泽民及共产党人谭平山、施复亮一起探讨过第三党的有关问题，他认为组织第三党的途径是“对国民党实行第三次改组，解散共产党的组织，统一革命的领导权，集中一切革命的势力，并确定向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进的具体纲领”。^②当时，谭平山同意邓演达组织第三党的主张，但认为共产党应该存在，主张通过改组国民党或另组第三党。可见在组建第三党的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意见。

然而，武汉形势突变，汪精卫积极准备实行宁汉合作。彭泽民访汪，汪痛骂共产党危党害国，要赶尽杀绝；又骂现在有人要组织第三党，我要先杀尽这些恶棍。邓演达处境孤立，改组国民党组织第三党已不可能，他于 1927 年 6 月 29 日愤然辞去所任国民党党政军各项职务，决意出走。6 月 30 日，邓演达留下一封“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公开信，离开武汉北上，后随同返国的苏联顾问团的车队，经五原、榆林，越沙漠至西伯利亚，最后于 8 月 15 日抵达莫斯科。

在临行前写下的公开信里，他坚信“总理的三民主义是

① 杨逸棠：《邓演达》第 33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 月出版

② 施存统：“第三党问题”蓝玉光：《第三党讨论集》第 28 页，上海黄叶书局，1928 年 10 月出版

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做去，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国民革命，”

“我始终认为三民主义如果受了曲解，农工如果受了摧残，革命分子如果被摈弃，政治工作如果被威胁，则不独党的革命意义和权威消灭，而且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以革命为职业的邓演达表示，“我并不是就永远离开了工作。我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革命的纲领，坚守着总理的策略，那我必立时受中央的命令立刻回来工作。”邓演达在莫斯科期间，与当时也在莫斯科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人士宋庆龄、陈友仁等交换意见，为组织新党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在莫斯科联名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打出了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帜。

《宣言》阐明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正意义，揭露了国民党内投机妥协动摇分子的叛变行为，指出“他们一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他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新的局势，中国革命的对象及主要动力，指出“革命的民众，由希望解放的空想而进入于实行斗争，由依靠‘好政府’盼望‘真命天子’的残梦中惊醒，必然的要在血泊挣扎，去进行新的解放自己的工作。”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伟大的领袖孙中山的精神领导底下，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得到最后的胜利——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这一重要文件，集中体现了邓演达

在大革命后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重新认识和思考，明确指出了第三党的奋斗方向。但是，这一宣言虽然打出了第三党的旗号，却并未成立正式的组织机构，真正开展活动。

而此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及政策有了很大改变，认为中国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已经结束，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通过武装夺取政权来赢得胜利。由此摒弃了与其它阶级联合的可能。此外，邓演达在向共产国际陈述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时，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他说，中国人民欢迎共产国际的友好援助，但是，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应由中国人民做主。^①这样，他在莫斯科组建第三党的活动，莫斯科显然不能见容。他于 1927 年 12 月间离开了莫斯科，转赴德国柏林。这期间，他与国内的一些同仁保持联系，继续为第三党的组建作准备。

第三党的组建活动，一直是在国内外同时进行的。在国内积极从事建党活动的是谭平山。1927 年 7 月，在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谭平山来到九江，积极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联络了大批国民党左派参加起义。8 月 8 日，他因此被武汉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

11 月，又因其继续从事第三党的宣传及有关活动，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除了他的中共党籍。此时，谭平山感到自己“像在大海航行中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

一样痛苦”^①，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消沉”，^①而是决心另寻革命道路，加紧了第三党的组建活动。莫斯科宣言的发表，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谭平山等人的建党进程。

1927年12月，谭平山等在上海建立了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联络了大批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失去了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积极筹组新党。在筹建过程中，他们对党名进行了讨论，认为国民党已被蒋介石篡夺，成为新军阀的工具，因此决定用“中华革命党”的名称，效仿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组建中华革命党以改组国民党的做法。

1928年春，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会议推选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李世璋、郑太朴、朱蕴山、季方、邓初民、马哲民、张申府、黄慕颜等人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由邓演达任总负责人，邓演达回国前，由谭平山负责。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后，谭平山起草了《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宣布“中华革命党是劳动平民阶级的政党”“中华革命之主义”是继承发扬“孙中山先生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及一切的革命行动”的“劳苦平民阶级的三民主义”。中华革命党派郑太朴将(宣言)草案带到德国，征求邓演达的意见。

刚刚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其活动还处于秘密状态，为了扩大影响，中华革命党在1928年5、6月间先后创办了《突击》、《灯塔》周刊并以各种途径进行宣传使外界了解到中华革命党的存在，并有了“第三党”之称。中华革命党在上

习仲勋：《在谭平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

28日

海、北平、天津、四川、山东、江西、福建等地开展了组织工作，至 1930 年春，成员已达一千余人。但其地方组织比较混乱，党内对指导思想、革命方式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也存在较大分歧，纷纷要求邓演达回国主持工作。

1930 年 5 月，邓演达回到上海。在德国期间，邓演达曾看过谭平山起草的《科学的三民主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回国后即与谭平山等商谈如何在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更富有战斗力的组织。他们在党的名称及指导思想方面发生了严重分歧。在讨论党的名称时，谭平山认为，国民党这面旗帜已被蒋、汪玷污，国民党已不再是革命组织，不能再用国民党这一名称。而中华革命党的名称既可表示我们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又可以表示与国民党决裂。邓演达则认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孙中山的主张尚未实现，要继承孙中山的事业，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国民党在社会上尤其是军队中有广泛的影响，可以利用这面旗帜以争取群众。最后，通过了邓演达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在讨论党的指导思想时，谭平山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遭到曲解，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重新解释，使之成为科学的三民主义。邓演达则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不可变易的根本原则”，要坚持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在其它重大问题上，邓演达的意见均得到多数同志支持，谭平山提出出国休息，全部工作由邓演达主持。

1930 年 8 月 9 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举行。有 10 个省区的代表参加，选出邓演达、黄琪翔、彭泽民、章伯钧、季方、郑太朴、罗任一、

朱蕴山、李世璋、丘哲、郭冠杰、王枕心、谢树英、丘学训、肖秉章、江董琴、杨逸棠、李毓九、陈豹隐、万灿、丘萼华、杨树松、潘震亚、詹显哲、邹兰甫等 25 名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为总干事。下设组织、宣传、军事、青年等委员会，创办了（革命行动）半月刊和（革命行动日报），并在各地建立机构，开展活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

2. 第三党的政治主张

“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①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需要确定自己的政治纲领，向社会公布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上，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性文件——《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一纲领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后，于 9 月 1 日正式发表在（革命行动）创刊号上。它系统地阐述了第三党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提出了平民革命思想和平民政权理论。

（政治主张）从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组织、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认为中国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受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的“前资本主义的时代”。

中国革命是复杂性的革命，是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属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中国虽还未曾具备，但是处在生产技术十二分发达的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94 页

日，如果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群众能夺取政权，则必能立即运用国家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大规模产业建设，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弊害，发展生产，为产业社会化的基础，向着社会主义前进。”^①革命的目的，就是“实现三民主义。”具体说，就是“要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

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受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压迫，不能顺利发展，因此“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是暗昧的”，既不能彻底扫除封建势力，也不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实无独立的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能力”^②，中国只有通过平民革命，即广大平民群众自己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

关于平民政权，第三党提出，“建立平民政权的先决条件是形成平民群众本身的组织”，唤醒平民群众和组织平民群众，集中平民力量，去夺取政权。新政权按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占 60%，其他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占 40% 比例，组成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要以有组织的职业团体代表构成中央及地方的发动机关，使参加生产各部门的民众确实的和政权联接而不发生隔阂，从而彻底的铲除官僚制度及军阀政治的积弊，不再发生新的官僚政治。在经济方面，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土

（邓演达文集）第 346 页

②（邓演达文集）第 348 页

③ 《邓演达文集》第 344—345 页

地政策方面，实行“耕者有其田”，逐步“达到土地国有”。

此外，《政治主张》还阐述了第三党的对外政策、社会政策、文化政策以及对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基本看法。

《政治主张》是第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政治纲领，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积极和有益的探索。在许多方面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相通的。正是基于这些政治主张，第三党开始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推翻南京政权的斗争

三、第三党与国共两党

邓演达组建临时行动委员会，是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另谋一条中国革命的出路。有人把他们对国共两党的态度，概括为“七分反蒋，三分反共”。而在实践上，他们所从事的基本都是反蒋活动。邓演达认为，当务之急是反蒋，要从军事着手，用武力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夺取政权。

1. 第三党的反蒋活动

首先，第三党进行了大量理论宣传揭露南京统治的本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社会影响。邓演达自 1930 年回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写下了二十余万字文章，包括《中国到那里去？》、《怎样去推翻反动的统治势力》、《奉军入关与时局》、《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内战中的中国》、《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怎么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蒋政府必然要崩溃的原因及全国人民当前的急务》等

在这些文章中，他尖锐地指出，南京政府的社会基础只

是官僚、豪绅、地主、银行家、买办，其统治形式是军事独裁与官僚政治，这种统治代表着一种制度的存在，这种制度只是代表最少数人的利益，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要求。它让人民感到的“是向来所未有的苛政，向来所未有的屠手，向来所未有的剥削与压迫。”^①他认为，“现时的南京统治内面，实充满了无限的矛盾冲突，随处都带着爆发新内战的可能，随时都还有崩溃的危机。”^②并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政治，干涉政治”，“推翻南京统治。肃清官僚政治。铲除军事专政。树立廉洁政府”^③。

第三党把反蒋军事活动摆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邓演达曾提出“军事第一”。关于怎么去组织平民革命军，他认为平民革命军必然“由平民大众当中的最勇敢最坚决的先锋分子所集成”，此外，“现在潜伏在国民革命军内面而忠实于农工平民大众的分子，必然能了解他们自己过去的光荣而与新起来的人民打成一片，形成新的革命武装”^④，由此，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在国民党军队内积极策划反蒋军事活动。

黄埔学生是蒋介石统治势力的基础。而“原始的、前数期的黄埔学生因系多富于冒险性及革命要求的分子，故随着南京政权的反动而行着剧烈的分化，”^⑤因而邓演达首先开始了组织黄埔学生的工作。1930年11月，在邓演达的直接组

《邓演达文集》第159页

同上，第238页

同上，第325—326页

同上，第311页

同上，第215页

组织和指导下，黄埔革命同学会在上海成立。邓演达对他们指出：“阻碍中国民族解放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我们要革命，就一定要反蒋。你们都是革命的黄埔学生，要一致组织起来反蒋，恢复黄埔的革命精神”^①。该组织在各地活动，发展很快。至 1931 年上半年，黄埔革命同学会会员人数以及受这一组织影响的黄埔学生达 5000 余人，而当时黄埔各期学生才一万余人。黄埔革命同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对蒋介石一手培植的黄埔同学会形成对抗，并使黄埔学生发生分化，震撼了蒋介石赖以存在的统治根基。

为了实现武装反蒋，邓演达等利用他们原来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and 影响，与国民党多支部队进行联络，希望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取一支由临时行动委员会直接掌握的武装。经过邓演达和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积极策动，陈诚的十八路军，自军长到各级官兵，大都倾向临时行动委员会。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也与邓演达建立了密切联系，共同制定倒蒋计划。西北军的杨虎城、邓宝珊也赞成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积极配合邓演达的反蒋军事计划。此外，一些地方实力派，如河南的张轸，福建的卢兴邦，四川的刘湘、邓锡侯等，也与临时行动委员会建立了联系。

邓演达与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军事反蒋活动，在全国各地影响很大，大有一齐响应，共同倒蒋之势，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惧和仇视。

1931 年 8 月 17 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给干部

黄雍：《黄埔革命同学会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 19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61 年 9 月版